

以色列右翼总理对美外交政策成因分析

李洁宇

(中共海南省委党校 政治学教研部, 海南 海口 571101)

摘要:“大以色列”信仰,即建立包括整个巴勒斯坦、横跨约旦河两岸的以色列国家,是以色列右翼政党利库德集团的立党之本。以色列右翼总理虽具有相同的利库德集团出身和共同的“大以色列”信仰,但在务实程度上却存在巨大差异,贝京在理想和现实间寻求妥协的政治权术,沙米尔对意识形态的坚持,内塔尼亚胡在坚守信仰和务实作风问题上的难以权衡,沙龙的现实主义使他们采取了不同的对美外交政策。

关键词:利库德;大以色列;务实主义;西岸

中图分类号:D838.2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9-3699(2012)03-0276-05

贝京、沙米尔、内塔尼亚胡和沙龙都曾任以色列总理,同属右翼政党利库德集团,具有相同的利库德集团出身,怀有共同的利库德政党集团信仰,但他们采取的对美外交政策却各不相同。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既是利库德集团党派信仰的践行者,又是注重实际、衡量利弊得失的务实主义者。意识形态和务实主义的碰撞,对信仰的坚守和向现实的妥协,构成了他们制定对美外交政策的进程。

一、对利库德集团立党思想的考察

利库德集团成立于1973年,前身是由雅博廷斯基创建的反英武装力量赫鲁特。赫鲁特在20世纪30年代,是犹太复国主义修正派的代表性组织力量。由于信仰不同,雅博廷斯基最终脱离了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领导阶层,并在很大程度上保持了行动的独立性。

雅博廷斯基的思想形成于20世纪前叶,极大地受到民族浪漫主义,尤其是意大利民族浪漫主义的影响,把民族主义看作积极的社会和政治力量。1924年3月,雅博廷斯基提出“大以色列”纲领:(1)犹太复国主义的目标是建立一个犹太国家;(2)国家的领土包括约旦河两岸;(3)方式是大规模的殖民运动^{[1]5}。雅博廷斯基坚持认为:只有通过强烈的要求、保持强大的政治压力和军事力量,犹太民族才能不做妥协、完全实现自己的目标。

以雅博廷斯基为代表的犹太复国主义修正

派,拒绝有妥协意味的、在1947年11月被联合国通过的“分治”计划,认为它是对赫茨尔犹太复国主义的背叛,放弃了重建犹太王国的努力^{[1]5}。

雅博廷斯基在领土问题上持强硬态度,拒绝任何阿拉伯人提出的对巴勒斯坦的民族、政治权利要求。雅博廷斯基承认阿拉伯有自己的民族特征,是一个独立的民族实体,但他反对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要求政治和民族权利的呼吁。雅博廷斯基通过对“民族自治权”和“公民权”进行区分,给与阿拉伯人“民族自治权”,在巴勒斯坦居住的少数阿拉伯人拥有广义上的“个人自治权”,但“公民权”意味着在巴勒斯坦将出现一个阿拉伯人的主权国家。这样,阿拉伯人可以在巴勒斯坦享有与犹太人同样的民事权利,他们组成的社区也可以享有相应的权利,但他们被禁止成立拥有主权的政治组织^[2]。

在处理阿以关系上,雅博廷斯基坚持在巴勒斯坦只能建立一个阿拉伯国家或犹太国家,没有中间道路。他认为只有两种情况会发生:犹太人有建立国家的权利,阿拉伯人的抵抗被视为不道德、不合法的;犹太人放弃建立国家的权利,犹太复国主义的理想化为泡影^[3]。

雅博廷斯基主张采取“铁墙(Iron Wall)政策”:犹太人应该建立“铁墙”,以对抗阿拉伯人的民族运动,并在剧烈程度不断升级的斗争中打败阿拉伯人。雅博廷斯基首先是一个自由主义者,然后是一个受殖民主义运动影响深远的帝国主义者。他的“铁墙政策”反映了帝国主义者的思维:

作为巴勒斯坦的原居民,阿拉伯人会反抗后来者,但最终将被代表更高文明水平的力量克服。

雅博廷斯基认为,历史上从未有过先例,在某个地区建立一个国家能得到原居民的同意。唯一能获得阿拉伯人同意的方式,是在以色列保持强大的实力,使之免受阿拉伯人压力的影响。泛阿拉伯主义的确存在,但作为一种国际力量它却不足为惧,因为民族主义分裂了伊斯兰世界,并削弱了它的力量^[4]。

雅博廷斯基是军事实力的忠实信奉者。他崇拜造就军事成功的素质:纪律、训练、命令、团结、忠诚、领导等等。贝塔是雅博廷斯基领导的一支青年运动组织,走的是公开的军事化道路,定期检阅,有自己的统一军装、军旗^[5]。雅博廷斯基敬仰的英雄人物是致力于夺取土地的战士,目标是建立一个国家。

二、利库德集团领导人对“大以色列”思想和巴以对立立场的坚持

在1977年利库德取得大选成功之前,工党在以色列国内政坛中占据支配地位。利库德成员舍弃工党,加入利库德这一举动本身,就表明了他们对“大以色列”信仰的支持。深嵌在利库德立党思想中的还有以色列对阿拉伯的不妥协态度。

贝京是雅博廷斯基的忠实崇拜者。1940年雅博廷斯基过世后,贝京率领伊尔贡,走上了武装反抗英国委任统治的道路。贝京坚持相信,二战结束后,英国将出台新的“巴勒斯坦分治”方案,以代替1937年已寿终正寝的旧方案。贝京追求的是最大化的犹太复国主义的目标,而不是英国支持的、本·古里安等人认可的有限的目标。贝京的反英武装运动,旨在离间犹太复国主义温和派与英国的合作,结束英国对巴勒斯坦的委任统治,破坏“巴勒斯坦分治”计划。以色列建国后,当选第一届议会议员的贝京猛烈抨击本·古里安,批评他默许约旦对约旦河东岸的占领。

1940年,伊尔贡分裂。沙米尔与亚伯拉罕·斯特恩另立“斯特恩邦”暴力集团,又被称为“铁血团”,沙米尔遵守斯特恩关于“国家重建”的18项原则。他明确指出:以色列的领土包括从尼罗河到幼发拉底河的广大地区;犹太人用剑征服了以色列的领土,只有通过这种方式以色列才能建国并获得重生;以色列对其领土拥有不能被剥夺的、绝对的所有权^[6]¹⁷⁶。“铁血团”的根本指导思想,在于联合英国的敌人以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冷战开始后,苏联成为“铁血团”现实上的唯一盟友。

对苏联的态度造成了“铁血团”的分裂:一派认为以色列和苏联接近是权宜之计,另一派倾向于真正接受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沙米尔表现出左倾立场,但最终没有加入左派,原因在于后者支持对巴勒斯坦和以色列的立场进行调解。1970年,沙米尔做出审慎决定,申请加入赫鲁特,并在该党负责移民工作。在沙米尔眼中,赫鲁特是唯一一个没有放弃“从尼罗河到幼发拉底河的大以色列”的党派^[6]¹⁸⁶。

对于巴勒斯坦这片犹太人曾缔造辉煌的领土,内塔尼亚胡怀有深厚的感情。在幼年时期离开巴勒斯坦远赴美国时,内塔尼亚胡对故土留恋不舍。内塔尼亚胡在麻省理工学院毕业后选择回国效力,并出于对“大以色列”的向往加入利库德集团。内塔尼亚胡对阿拉伯人的仇恨难以消除,他在以色列驻美国大使馆工作时,通过媒体极尽所能地丑化阿拉法特和巴解组织的形象。当阿拉法特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表态要通过政治途径弱化阿以冲突时,内塔尼亚胡用“虎头蛇尾”来形容对方^[7]²⁰⁴。不管他是否对利库德集团的“大以色列”政策有深刻的认同感,他都要在表面上如是行为,否则,缺乏深厚政治根基的他难以巩固自己的地位。

沙龙本是工党成员。在美国的压力下,工党政府对阿拉伯人作出的妥协,在沙龙看来是软弱的表现。怀着对工党的失望,沙龙加入了利库德集团。幼年时期的沙龙,在父母的熏陶下,养成了仇恨阿拉伯人的性格。对阿拉伯人民的仇视伴随其一生。在贝京执政时期,沙龙担任国防部长,指挥了史称第五次中东战争的黎巴嫩战争,对长枪党屠杀两个难民营的罪行难辞其咎。在沙米尔执政时期,沙龙担任住房部部长。也许是潜意识里认识到该届内阁不会长久,沙龙积极推进西岸定居点建设。

三、对利库德集团领导人不同务实程度的考察

越积极地参与政治,越在政治斗争中发挥主导作用,越能培养出灵活务实的风格,越能在国内外压力中左右逢源。外有安全之虞,内有派系之争,是以色列这个国家最大的现实。能攀登权位的政客,无外乎两种情况:机缘促成的机会主义者和审时度势、驾驭风云的历史缔造者。贝京长期担任反对党领袖,游走在政治体系的边缘,凭借高超的政治手腕和控制舆论媒体、煽动民众情绪的政治能力,得以在复杂的以色列派系斗争中纵横

捭阖,并攀登上权力的巅峰;沙龙的一生,既驰骋过血雨腥风的战场,也叱咤过波诡云谲的政坛;相对于贝京和沙龙,沙米尔和内塔尼亚胡上台,更多是环境造就的产物。

在犹太复国主义修正派内部,贝京打响了反抗英国委任统治的第一枪。以色列建国初期,贝京为分享胜利果实,大力歌颂伊尔贡的功劳,称其在结束英国的委任统治上责无旁贷,得到了很多民众的认可,并为赫鲁特得到了议会的入场券。当以色列举国上下展开辩论,以色列是否应该获取德国赔偿的时刻,贝京率领民众举行大游行,反对以色列和德国关于赔款问题进行直接谈判,并义正词严地批评工党政府向刽子手索要赔偿的行为。但之前,贝京本人曾提出用德国赔偿挽救以色列经济危机的可能性,此次发难是为借机扳倒工党政府^{[6]49}。

在第一次中东战争期间,沙龙便崭露头角,受到本·古里安的赏识,也深受老前辈——以色列另一位战斗英雄摩西·达扬的器重。他在工党政府和利库德政府中都颇为得势。沙龙是凭借超强个人能力、攀登权力巅峰的典范。第四次中东战争,以色列由于准备不足,伤亡巨大。面对民众追究政府责任的要求,沙龙在关键时刻,背叛了曾对自己有提携之恩的国防部长达扬。这一落井下石之举凸显了沙龙的务实主义。在贝鲁特难民营惨案之后,沙龙被迫辞职。贝京1983年辞职后,沙龙和同僚一起,推举沙米尔作为利库德集团的候选人。当时沙米尔年事已高,沙龙继承权位是迟早的事情。深谙权力政治之道的沙龙处理实际问题,能抓住问题的要害所在。

加入利库德集团之前,沙米尔曾经营一家小型橡胶厂,后因难舍“大以色列”信念告别商场重返政坛。沙米尔没有轰轰烈烈的从政经历,却以稳健、保守而著称。1983年,贝京辞去总理职务后,没有指定自己的接班人,沙龙因贝鲁特难民营事件广受谴责,为保险起见,利库德中央委员会推举沙米尔领导该党派,以应对贝京的离去带来的骤然变化。沙米尔当选,起到了维持利库德的利益和稳定局面的作用。可见,沙米尔攀登权力巅峰,主要是外因促成的结果。

内塔尼亚胡在政坛上算不上是大佬级的人物。他曾任以色列驻美国使团副团长。凭借驾驭媒体的能力、娴熟的英语,内塔尼亚胡在丑化巴解组织的形象上不遗余力,为以色列在巴以问题上赢得了更多的主动权,也因此为自己挣得了政治资本^{[7]383}。内塔尼亚胡是媒体大战中的幸运儿,

而不是凭借战功或政治功绩赢得民心的政治家。在竞选总理时,他受到对手的攻击,被冠以“投机主义者、缺乏政治智慧、只有不入流的政治伎俩”等罪名。一来缺乏强有力的竞争对手,二来得益于以色列民众的念旧情绪——内塔尼亚胡的已故兄长是以色列昔日最优秀的军官^[8],内塔尼亚胡如愿登上了总理宝座。在竞选中打出“大以色列”的旗号,塑造起强硬形象,并以此赢得了大批支持强硬政策选民的选票,为保全本已微弱的政治资本,他就要在政治实践中兑现诺言。受到如上牵制,内塔尼亚胡想迈出资本步伐,困难重重。

四、利库德集团出身的总理 对美外交政策演变

贝京在坚持信仰的前提下,发挥灵活务实特征,保全了美国的颜面,客观上促进了中东和平进程。沙米尔受制于意识形态,对美国促进巴以和谈的热心反应淡漠,态度强硬地推进西岸定居点建设,致使以美关系滑至冰点。内塔尼亚胡坐稳权位的资本就是兑现竞选诺言,遵从“大以色列”信仰行事,他在西岸撤军问题上摇摆不定的立场让善于斡旋的克林顿也莫可奈何。沙龙以务实为先,不受意识形态的约束,权衡利弊后,做出从西岸和加沙地带撤退的决定。

(一) 贝京:“用西奈半岛换西岸”

贝京第一任期内,中东出现和平曙光。美国总统卡特有促进中东和平的坚定决心,埃及总统萨达特强烈要求打破中东“不战不和”的僵局,并首先向以色列抛出了橄榄枝。在埃以会谈期间,贝京在西奈半岛的定居点问题上据理力争,几次使谈判几近中断。在卡特的灵活斡旋下,埃以签订了和平条约。贝京的“大以色列”计划,不包括西奈半岛。“用西奈半岛换取约旦河西岸”是贝京在国际压力,尤其是恩主美国强大压力和促和决心之下的选择。

埃以会谈的最后阶段,贝京同意:把西奈半岛和空军基地归还给埃及,撤销其上的定居点;在巴勒斯坦人民参与和西岸及加沙居民同意的前提下,全面解决巴勒斯坦问题;巴勒斯坦问题解决的进程,应该有约旦、埃及、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人民的代表参加;巴勒斯坦人民的合法权利和公正要求应该被满足。《戴维营协议》埃以条约中使用的语言清楚明了,为实际问题规定了解决的期限,如写明埃以边界以1906年划定的为准,以色列军队完全从西奈半岛撤出等等。但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条约却充满歧义,而且充斥了大量原则性的语

言。协议的履行需各方达成一致意见,以色列有否决权^[9]。

贝京坚持认为,“自治”权利应赋予居民,而不是领土。西岸的“自治”权应交由11人委员会,后者将履行行政管理职能,为巴勒斯坦居民提供教育、宗教、住房、交通、卫生、农业和福利方面的服务。如果这个委员会自行宣布为过渡时期的巴勒斯坦政府,它将被该地的最高权威——以色列军事政府解散^[10]。贝京把自治的终点看做以色列对西岸和加沙地带的完全占领,而不是以色列在这些领土上作出的妥协。

贝京抓紧吞并西岸的步伐。工党当政时,遵循与被占领土有关的“海牙原则”第52条款,获取土地以用于军事目的。当在被占领土上兴建平民定居点时,它的行为合法与否要受到最高法院的审查。而在利库德执政的年代,获取土地有了新的名目——“国家权利”或“国家安全需要”。利库德的土政策带有强烈的反阿拉伯色彩。它限制阿拉伯人的居住点建设,用犹太人的定居点将阿拉伯人的城镇分离开来,防止他们形成聚集区,并对阿拉伯人的定居点形成包围之势。

在贝京刚就任总理时,在西岸和加沙地带只有24个犹太定居点和3200个犹太人定居者,当贝京1983年辞去总理职务的时候,那里已经有106个定居点,定居者达到28400人。短短6年时间,贝京将定居点数目扩充了4倍,定居人数扩充了9倍^[11]。

(二)沙米尔:“把西岸的犹太定居者扩张到12万也不算多”

沙米尔主张,中东和平进程应该建立在《戴维营协议》和联合国242号、338号决议的基础上,不能有巴解组织和所谓的巴勒斯坦国家的参与。在三年的过渡期结束后,关于领土最终地位问题的谈判才可以开始^{[6]250-251}。

1989年9月,埃及总统穆巴拉克提出了“十点”计划。他建议:以色列应该接受公众意见,国际观察员应在场;以色列国防军应该从投票区撤退;在大选当天,应禁止以色列人出现;阿拉伯人应给与充分的自由,散发大选宣传单;以色列应遵守“土地换和平”纲领,终止定居点建设活动;东耶路撒冷的阿拉伯居民应该被允许参与和平进程^{[6]257}。

1989年10月,美国国务卿贝克继续对以色列施加压力,推出自己的五点中东和平计划:阿以会谈应在开罗召开;穆巴拉克政府应向以色列、巴勒斯坦和美国进行咨询;美国应该满足巴勒斯坦

的条件;美国将在沙米尔计划的基础上参与;巴勒斯坦将有谈论选举和提出任何问题的自由。贝克认为以色列应该改变建立“大以色列”这一不切实际的想法,放弃已占领的领土,结束定居点建设活动,把阿拉伯国家当做应获取政治权利的邻居。贝克坚持认为“土地换和平”是推动和平进程的唯一真正途径^{[6]254-257}。

以色列内阁中的温和派,表现出希望沙米尔积极回复贝克计划的强烈意愿,而保守派要求沙米尔坚决拒绝该计划。沙米尔走不想开罪任何人的中间路线,不作答复。1991年9月,老布什总统预见到中东和平计划被以色列破坏的可能,要求国会将预计给与以色列的100亿美元贷款保证延迟120天。支持利库德政策的美国犹太人组织发起运动,要求美国在人道主义基础上对以色列提供贷款保证。布什在压力下没有让步,他抨击制造压力的人:“我听说今天,有一千名国会山上的议员站在我的对立面,即使只获得一张选票,我也不介意。”^{[6]266}

伊拉克入侵科威特,减轻了美国对以色列的压力。阿拉法特站到了支持巴解组织的海湾国家的对立面,他试图在危机中加以斡旋的行为使他被冠以“伊拉克政权代理人”的名谓。沙米尔趁着以色列和平人士对阿拉法特不再抱有期望的时刻说:“在依赖沙特阿拉伯和科威特的资金支持数年后,阿拉法特正在暴露自己的真面目。世界各国领导人应该睁开双眼,和巴解这个虚伪罪恶的组织划清界限,并把他们的代表从自己的领土上驱逐出去。”^[12]1991年底,因为认为海湾战争后的形势明显有利于以色列,沙米尔决定去马德里参加和会。沙米尔自认为,通过不置可否、模棱两可和在细节上穷追不放的外交政策,可以回避与利库德立场相悖的问题。沙米尔为争取被占领土上的选票,向定居点居民许诺,不会据美国要求停止定居点建设。这一举动恶化了以美关系。1992年5月,贝克告诉美国犹太人组织的领袖,因为沙米尔违背了他于1991年2月在私下场合做出的承诺,以色列不会得到100亿美元的贷款。沙米尔反击,说美国已经向阿拉伯人许诺以色列不会得到贷款保证,并说“12万定居者也不够多”,这种激烈的论调使以美关系持续降温^{[6]276}。

(三)内塔尼亚胡:“以实力求和平”

1996年5月,内塔尼亚胡上台后,拒绝进一步贯彻《奥斯陆协议》,不提倡“以土地换和平”的原则,而是坚持“以实力求和平”。他拒绝执行其前任拉宾政府和巴勒斯坦签订的《塔巴协议》。该

协议为扩大巴勒斯坦在加沙和西岸的自治作了若干规定,如分三阶段继续从西岸和加沙地带撤军,第一阶段撤出西岸约30%的领土^[13]。内塔尼亚胡要求针对撤军问题重新进行谈判。

1997年2月底,内塔尼亚胡宣布第一阶段只能从西岸撤出2%的土地,3月初又提出第一阶段最多只能撤出约9%的西岸土地^[14]。当年10月27日,内塔尼亚胡宣布“五不”政策:不再向巴方归还更多土地,不放弃戈兰高地,不单方面从黎巴嫩撤军,不停止修建犹太人定居点,不放弃“耶路撒冷是以色列不可分割和永久的首都”这一立场。

美国总统克林顿动员各方力量,如时任联合国秘书长安南,推动中东和平进程。1998年10月23日,巴以双方签订《怀伊备忘录》,规定以色列将分三次向巴勒斯坦方面移交13.1%的土地,和巴勒斯坦在严厉打击恐怖主义活动方面的义务^[15]。12月20日,以色列内阁宣布终止执行《怀伊备忘录》,并为从西岸继续撤军附加了五项政治条件。

内塔尼亚胡执政期间,中东和平进程进入了自《奥斯陆协议》签订以来的最低潮。为挽救中东和平,克林顿展开其任期内的第四次中东之行,并与内塔尼亚胡进行会谈。克林顿许诺向以色列提供12亿美元的附加援助,以鼓励对方履行《怀伊备忘录》,但内塔尼亚胡却拒绝对原定于12月18日开始的第二期撤军目标做出任何承诺。

(四)沙龙:从西岸和加沙地带撤退

2001年,因为强行“访问”清真寺,而使巴拉克和谈努力付之东流的“铁血”人物沙龙上台执政。美国时任总统小布什在阿以问题上采取“超脱”政策,表示不积极推进中东和平进程^[16]。9.11恐怖事件使美国的反恐大业提上日程。小布什总统希望中东局势保持平稳,使阿拉伯国家加入反恐阵营。2001年9月17日,沙龙在接受访问时说,只要巴以之间存在冲突,他便不会妥协,不会采取自我克制的措施,不会付出代价去迎合美国。在全世界的目光集中于美国之时,以色列加强了对巴勒斯坦的报复式攻击,沙龙拒绝佩雷斯和阿拉法特会谈^{[6]294}。

在任职于内塔尼亚胡内阁期间,沙龙曾强调自己对利库德集团立党之本——犹太复国主义的坚持,以区别于内塔尼亚胡的务实主义。但攀登权力巅峰的沙龙,却展现出了更为强悍的现实主义作风。加沙地带冲突频发,成了巴勒斯坦恐怖主义组织哈马斯和以军的战场,不断攀升的以色列士兵伤亡数字已使该地区成为以色列不堪承受

之负担。日内瓦倡议称,把耶路撒冷旧城一分为二。沙龙在议会宣称,以色列选择有三:消灭巴解组织,吞并加沙地带和约旦河西岸;遵循对以色列而言是灭顶之灾的日内瓦倡议;无所作为,任国际社会裁决^{[6]319}。几番比较,沙龙决定从加沙撤军。2004年2月,以色列正式宣布,分别从加沙地带和约旦河西岸正式撤走17个和4个定居点^{[6]314}。这一举动迎合了美国的反恐措施。

五、结语

虽然认同“大以色列”的信仰,但由于个人务实程度的差异,利库德集团出身的总理,采取了不同的对美外交政策。内塔尼亚胡第二任期内,是否会改变以往对美国的不合作态度,是个值得关注的问题。再次登上总理宝座,内塔尼亚胡应该会从昔日的总理经历中汲取教训,选择最佳的外交决策,以回应求“变”心切的奥巴马政府。鉴于拉宾在第二任期内,采取了和之前有明显差异的外交政策,主动向巴勒斯坦伸出橄榄枝,我们似乎有理由期待,内塔尼亚胡将呈现出让世人期待的姿态。

理论上虽如此,在多变的政治现实中,答案从来就不是唯一的。内塔尼亚胡略显稚嫩的政治背景,他主张建立“非主权国家”的宣言,提醒着我们中东和平进程将会遭遇的曲折坎坷。进一步讲,除却领导人自身的因素外,国内利益集团的压力也至关重要。伴随着巴以冲突的频繁化、不可预期化和升级化,利库德甚至以以色列民众的立场越来越趋于强硬。巴以和平进程何去何从,仍是个充满不确定性的问题。

参 考 文 献

- [1] Ilan Peleg. Begin's foreign policy(1977-1983): Israel's move to the right[M]. New York: Greenwood Press, 1987.
- [2] Walter Laqueur. A history of Zionism[M]. New York: Holt, Rinehart and Winston, 2003:348.
- [3] Shlomo Avineri. The making of modern Zionism: intellectual origins of the Jewish state[M]. New York: Basic Books, 1981:179.
- [4] Sasson Sofer. Zionism and the foundations of Israeli diplomacy[M]. The United Kingdom: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217.
- [5] Joseph Schechtman. Fighter and prophet: the Vladimir Jabotinsky story[M]. New York: Thomas Yoseloff, 1961: 476-477.

(下转第290页)

该是那些努力上进、奋力自救的个人。”^{[4]23-24} 资金困境是制约许多公益组织成长的“瓶颈”,有了南都的资金支持,许多公益组织可以做自己想做的项目,在项目的实际操作中累积了经验、增长了能力。实践证明:有效发挥资助型公益组织的资助功能对于提升灾害治理绩效具有重要意义。

参 考 文 献

- [1] 中国共产党第十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文件汇编[G].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51.
- [2] R Dynes. Organized behavior in disaster[M]. Lexington, MA: Lexington Books, 1970.

- [3] 朱健刚,王超,胡明. 责任·行动·合作——汶川地震中 NGO 参与个案研究[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16.
- [4] 安德鲁·卡内基. 财富的福音[M]. 杨会军,译. 北京:京华出版社,2006.
- [5] 资中筠. 散财之道——美国现代公益基金会述评[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 [6] 托克维尔. 论美国的民主:下[M]. 董果良,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682.
- [7] 埃米尔·涂尔干. 社会分工论[M]. 渠东,译.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

[责任编辑 彭国庆]

(上接第 280 页)

- [6] Colin Shindler. Israel, Likud, and the Zionist dream: power, politics, and ideology from Begin to Netanyahu[M]. London: I B Tauris, 1995.
- [7] Benjamin Netanyahu. A place among the nations: Israel and the world[M]. New York: Bantam Books, 1993.
- [8] 杨曼苏. 以色列总理拉宾[M]. 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 237.
- [9] The Middle East: U. S. policy, Israel, oil and the Arabs [R]. Washington: Congressional Quarterly, 1979:220-222.
- [10] Joseph Nedava. The Arab-Israeli conflict[M]. Israel: Revivim, 1983:461.
- [11] American Friends Service Committee. A compassionate peace: a future for the Middle East[M]. New York: Hill and Wang, 1982:21.

- [12] Yitzhak Shamir. Summing up: an autobiography [M]. Boston: Little Brown, 1994:225.
- [13] David Lea. A political chronology of the Middle East [M]. London: Europa Publications Limited, 2001: 123.
- [14] Rachelle Marshall. Media support for Netanyahu undercuts U. S. Middle East objectives [R]. U. S. Congressional Special Report, 1997(4):9-10.
- [15] William J Clinton. Remarks at the Eye River Memorandum signing ceremony[R]. Public Papers of the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Washington: U. 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99:1 836-1 838.
- [16] 赵伟明. 中东问题与美国中东政策[M]. 北京:时事出版社, 2006: 410.

[责任编辑 梅全亮]